

## 世界中的歐洲和中國<sup>1</sup>

馬努埃爾·波爾圖

Manuel Lopes Porto

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執行委員會主席、教授

擁有超過全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和高速增長市場的中國引起了歐洲和全世界的熱切關注。

確切地說，目前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於全世界生產總值的3%，十二億八千五百萬人口擁有一萬一千五百九十億美元<sup>2</sup>。但是，根據近十年的年增長速度來看，1992-1995年之間，中國年增長速度超過了兩位數（1992年達到了14.2%），從1991年到2001年的平均年增長速度為9.8%，加上對未來幾年的預測，可以預見中國會以非常快的速度接近發達國家。對中國市場重要性的認識體現在投資者身上，中國吸引了非經合組織國家私人投資總量的最大份額。

這一切始於鄧小平“摸著石頭過河”的經濟開放（對內和對外）政策。有意思的是，在幾十年前，世界範圍內經濟增長績效最出色的是實行經濟開放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即“亞洲四小龍”，而經濟十分封閉的兩個大國——中國與印度——卻處在落後的位置<sup>3</sup>。

<sup>1</sup> 此文章為2003年10月27日的“澳門基本法框架下的澳門法律——最近發展與展望”研討會的講稿及於2003年2月2日的葡文法學士課程之經濟學之堂上內容為基礎的修改文本。

<sup>2</sup> The Economist，《用數字表示的世界》，2003年，第14-24頁。

<sup>3</sup> 因此，中國和印度在被當時的著作中劃分為不發達地區，請參閱Richard Gill，《經濟發展入門》，Prentice-Hall，1962年（現代出版社譯本，里斯本，1963年，單

鑒於中國與印度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實現的經濟增長，以及兩國的人口因素，在關於欠發達經濟的統計中，考慮中國與印度與不考慮中國與印度的情況就會存在根本的差異。在 1998 年，如果把兩國數據納入低收入國家的統計，國內人均生產總值為 2130 美元（在 1990-1998 年間年平均增長 7.3%）；如果不考慮中國和印度，低收入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是 1400 美元（同期年平均增長為 3.6%）<sup>4</sup>。

## 二

下面的內容反映了經濟理論和實踐所得出的結論。

在理論方面，顯然，最新的理論研究成了支持自由貿易的最佳論證。比如，貿易理論不局限於解釋自由貿易本身，而且還證明通過自由貿易可以獲得總體收益。特別重要的是國內扭曲理論<sup>5</sup>，它證明當國內要實現某項目標時，正確的（非扭曲）干預應該也是在國內範圍進行的，而不是採取貿易保護的手段。國內扭曲理論還為其他不同的研究提供了極大的啓示，例如，是否應該在某國內建立一種或多種產業（朝陽產業論）：如果應該建立該產業，不能損害貿易、消費者以及其他利益。與這些理論相比，一時的規定（如凱恩斯的主張）或者成本較小而實施起來更容易的關稅措施，隨著國家行政機器的完善，失去了重要的地位。此外，自由貿易理論還從整體社會福利的角度做出了論證，因此沒有陳舊的貿易條件論或現代貿易理論的缺陷<sup>6</sup>，因為除了某些例外情

---

獨設立一章介紹中國和印度，其他不發達地區如非洲被作為一個整體研究）。

<sup>4</sup> 參閱馬努埃爾·波爾圖，《經濟：導讀教材》，Almedina，科英布拉，2002年，第517頁。關於中國經濟開放取得的成果，可以參閱魏丹，《中國與世界貿易組織》，Almedina，科英布拉，2001年；關於印度取得的進步，參閱Gurcharan Das，《被解放的印度》，Penguin，新德里，2002年。

<sup>5</sup> 參閱Jagdish N. Bhagwati，《扭曲理論概述與福利》，載於Jagdish N. Bhagwati, Ronald W. Jones, Robert A. Mundell 和 Jeroslav Vanek（編著），《貿易、收支平衡和增長》，為紀念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國際經濟論文，North-Holland 出版公司，阿姆斯特丹和倫敦，1971年，第69-90頁；以及Max Gorden《貿易政策和經濟福利》，第2版，牛津大學出版社，牛津，1977年（第1版為1974年）（引自馬努埃爾·波爾圖，《一體化理論和歐洲聯盟政策》，科英布拉，2001年，第147-162頁）。

<sup>6</sup> 參閱Paul Krugman，《國際貿易再思考》，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劍橋（馬薩諸塞），1990年；《新貿易理論是否需要新貿易政策？》，載於《世界經濟》雜誌，

況，在後者中，某些利益的取得是以犧牲貿易伙伴的利益為代價的。

在事實方面，在不同時期，無論是個別學者從事的研究還是著名國際組織的研究項目（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sup>7</sup>、國家經濟研究局<sup>8</sup>或世界銀行<sup>9</sup>）都表明各國在貿易更加開放時期取得的最佳績效<sup>10</sup>。

### 三

然而，面對直接的困難，或者看到國內市場被來自其他地區的產品佔據時，所有這些理論與實踐的證明還不能阻礙某些人再次為進口設置障礙。

但是，除了針對這種態度的任何評價之外，我們根本不能理解這種過於天真的想法，因為當我們保護自己時，其他國家也必然由於對我們出口的減少而減少進口我們產品的數量。貿易報復的措施，或者單單出口行業收益分配的減少，可以導致我們的出口活動最終蒙受損失，其程度也許比替代進口的活動要大得多。

歐盟有很大的貿易順差，對這種過於天真的想法就更不能接受。可以想像，前不久由於歐盟出口可能減少給我們經濟所帶來的困難。

---

第15卷，1992年，第423-424頁。

<sup>7</sup> 總結了 Ian M. Little, Tibor Scitovsky 和 Maurice F. Scott 的觀點，《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和貿易》，牛津大學出版社，經合組織，倫敦，1970年。

<sup>8</sup> 總結了 Jagdish N. Bhagwati 《貨幣兌換管制的剖析和後果》，國家經濟研究局，Ballinger 出版公司，紐約，1978年，以及 Anne, O. Krueger 《貿易自由化的嘗試與結果》，國家經濟研究局，Ballinger 出版公司，紐約，1978年。

<sup>9</sup> 世界銀行在該領域的第一個研究項目始於六十年代，可參閱 Bela Balassa 等編者，《發展中國家的保護結構》，Johns Hopkins 出版社，世界銀行和泛美發展銀行，巴爾蒂默和倫敦，1971年。另一個項目在八十年代進行，名為“貿易自由化政策的時機選擇與後果”，參閱 Demetrios Papageorgiou, Armeane M. Choksi 和 Michael Michaely (編著)，《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自由化：學到的經驗》，Basil Blackwell，牛津，1990年至1991年；關於葡萄牙的研究由喬治·馬塞多 (Jorge Braga de Macedo)，克里斯蒂娜·科拉多 (Cristina Corado) 和馬努埃爾·波爾圖完成，《貿易自由化政策的時機選擇與後果：葡萄牙1948-1986》，論文第114號，里斯本新大學經濟學院，1988年）。

<sup>10</sup> 關於最新的研究，請參閱 Jeffrey Sachs 和 Andrew Warner，《經濟政策和全球一體化進程》，載於《關於經濟活動的布魯克森報告》，1995年，第1期，第1-118頁。

四

從現實和負責任的角度看，在較落後的國家會存在更多的問題，而且有些問題還相當棘手。

這些國家除了在某些情況下（不是全部），出口產品與進口的產品以及服務相比微不足道（貿易條件惡化），在更多的時候，沒有任何可能令國內的產品在海外佔據重要份額。相反，國內市場很大程度都是由進口產品所填補的。

因此，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公民可能被反全球化的浪潮所吸引；但是，要解決棘手的問題，就要冷靜地分析貿易保護戰略是否有助於國家的發展。

我們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當被發現某些新興產業在開放經濟的條件下可能具備競爭力時，實施過渡性的干預是必要的（按照提到的朝陽工業的邏輯）。但即使這樣，如前文所述，原則上應該使用（國內）直接扶持的手段，任何時候都不能不意識到，限制進口和徵收關稅使購買消費品的消費者蒙受了損失，而且，由於裝備品和支持生產的服務減少，國家的發展也會受到損害。

需要一提的是，更落後國家的發展能夠通過提高出口競爭力來實現，發達國家降低關稅稅率是令人歡迎的<sup>11</sup>（隨著有效保護率的提高，最終為本國的消費者和眾多企業家帶來了效益）。

目前，世界上較大的區域貿易集團實際上採用了較低的進口關稅（或較少的數量限制），然而某些其他干預形式構成了不能令人接受的貿易保護手段，這應該引起特別的關注。其中較為常用的是，反傾銷措施被用於事實上不存在傾銷的情況（出口價格比國內價格低得多）或（不正確地）向那些事實上還不具備遵守發達國家規則的較落後國家援引社會或生態傾銷。

此外，對於不遵守價格規律（傾銷）、社會規則或環境要求的最終認定，不應該由進口國家來執行，而是應該通過一個獨立的機構，如世界貿易組織。

<sup>11</sup> 引自 Marie-Annick Barthé，《歐盟經濟手冊》，第2版，Economica，巴黎，2002年，第27-28頁。

考慮到現時的困難和需要進行的工作，國際貿易仍應該繼續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國際貿易（以及投資）在過去的幾十年在大部分世界不發達地區都取得了事實上長足的增長<sup>12</sup>。

使經濟（尤其是更富裕的經濟）充滿活力的世界貿易還構成了向不發達國家擴大金融手段支持的必要條件（也正像前文所述，是擴大國內產品佔有市場的必要條件）<sup>13</sup>。

今天，顯然，光有貿易（trade）是不夠的，援助（aid）也十分必要，因為現實中有些國家通過出口獲益很少或毫無收益。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應該對這些國家具備條件的產業的發展提供必需的（直接）國內支持。

## 五

也許有人對其他國家產生懷疑，但無人置疑中國是國際貿易的獲益者。參與國際貿易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之一，1994年中國經濟的開放指數達到了22.71%（後來又有所下降），而在1978年經濟開放指數才為4.5%，1982年也不過是6.53%（引自魏丹上述者作，第22頁）。

因此可以理解，繼坎昆（Cancun）WTO部長會議（2003年9月）在中國領導下的發展中國家導致談判破裂帶來的“成功的喜悅”之後，來自發達國家的聲音立即詢問，是否中國不再是世界貿易開放的最關注者之一，正因為經濟開放，中國在正在進行的談判中取得了成功。

## 六

中國有超過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單獨一個國家就構成了一個“區域集團”。然而，不禁有人會問，中國是否傾向發展成世界其他地區的保護性區域集團，例如在歐洲，歐盟的區域內貿易的依賴程度約佔全部貿易的70%。

<sup>12</sup> 引自世界銀行，《進入二十一世紀——世界發展報告1999/2000》，牛津大學出版社，紐約，2000年。

<sup>13</sup> 國際貿易對不發達國家的重要性在前面注解中世界銀行報告裏面被提到。

有人認為，歐洲市場巨大，為甚麼要向來自中國和來自其他勞動力更廉價的國家的競爭力很強的產品開放市場？歐洲應該成為一個阻礙性的區域集團，而非一個建設性的區域集團<sup>14</sup>。

這種擔憂自然表現在中國，因為歐洲是中國出口產品的主要市場之一。

形成封閉區域集團的可能性，可以歸結於本質相當差異的原因，包括：因為本國是較大經濟規模區域集團的成員，便對自由貿易付出較少的努力或不付出努力<sup>15</sup>；貿易保護的思想（fortress mentality）認為“一個強大的區域市場是為外部競爭設置障礙的藉口”<sup>16</sup>；因此可能缺少政治支持（“區域協議也許會損害對多邊協議的廣泛的政治支持”），或者還影響到不再可利用的或不再為世界自由貿易而努力的區域項目中的人員與能源<sup>17</sup>。

然而，事實表明上述情況並非是目前的趨勢，向實現全世界自由貿易方向的努力更加強大，這不但有助於區域集團內貿易的增長，也有助於區域集團外貿易的絕對增長。

從這個意義上看，人們更加認識到了自由貿易的更大優勢。我們知道，儘管實踐經驗與理論相一致，但面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勢力，這些認識還顯得很不夠。然而，隨著有利指數的積累（前文提及的理論及實踐），它們將繼續發揮影響，在天平砝碼盤中，自由貿易的一邊會佔有越來越重的份量。

<sup>14</sup> 與Rebert Z. Lawrence的觀點不同，《新興的區域安排：建設性的集團或阻礙性的集團？》，該文章載於Richard O'Brian（編著），《金融和世界經濟》，第5卷，牛津大學出版社，倫敦，第22-35頁。

<sup>15</sup> 引自Philip Lévy，《自由貿易協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載於《美國經濟評論》，第87卷，1997年，第506-519頁。

<sup>16</sup> Jaime Serra等編，《區域主義思考：國際貿易研究小組報告》，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華盛頓，1997年（也請參閱Robert Hine，“改變中的世界貿易環境：區域主義和多邊主義”，科英布拉大學法學院學術會議，1997年3月14日）。

<sup>17</sup> Serra等編著中提到這種觀點：“區域協定也可能使國家領導人轉移多邊合作的資源和政治資本。如果多邊談判的專家被要求把他們的時間花費在研究區域安排上，多邊自由化的腳步將會減慢”。

自然，上述作者同樣就區域集團偏離世界自由貿易的負面影響進行分析和評估（參閱馬努埃爾·波爾圖，《一體化理論和歐洲聯盟政策》，第550頁）。

毫無疑問，放棄貿易保護措施總會使某些行業受到損失並產生失敗或至少不安的情緒。但是，這應該與公民整體利益和沒有開放貿易的情況（*anti-monde*）相比較，同樣存在獨立於我們之外的因素也可以導致負面影響（可能程度更大），比如失業<sup>18</sup>。

烏拉圭回合之後，自由貿易的優勢更加突出了。根據估計，在1995-2000年之間，自由貿易的福利收益相當於五億一千萬美元。

根據這些估計數字，獲益最大的將是歐盟，其次是美國。但是，自由貿易將使全世界所有地區都受益，這些收益將有助於接受自由貿易。

在存在利益衝突時，與那些滿足於現有區域發展規模和利潤的較小企業相比，大型跨國公司不滿足於地區範圍，因為擁有較強的競爭力，也就獲得更多的利益<sup>19</sup>。

無論是否是大型企業或集團，在目前大多數國家正在進行的私有化進程中，經濟的開放程度表現得很高：與公共機構不同，私人企業家不願意放棄貿易開放和市場這運作帶來最高效率的機會<sup>20</sup>。

實際上，不能預見只有國有企業才希望貿易保護，在很多情況下，因為經濟開放失去了優勢，對競爭準備不足的私有企業也會通過游說活動支持貿易保護。這些企業不具有大型企業和集團更直接的影響途徑，而是利用選民人數的壓力、工人以及地理位置，通過本身機構的代表，聯合資方和勞工的機構來挽救面臨風險的企業和工作崗位。

另一方面，Cabel<sup>21</sup>認為，區域一體化的形成，實際上是通向世界

<sup>18</sup> 葡萄牙的經濟是一個非常依賴外國市場的例子，比如在特別創造就業的產業，如紡織業和服裝製造業、製鞋業、汽車工業、陶瓷工業、林業等。可以設想一旦出口產品的市場被關閉以後造成的損失。正如我們前面剛剛強調的，顯然不能認為只有我們能關閉市場而其他貿易伙伴不會這樣做。

<sup>19</sup> 作為歐洲議會的發言者，我們曾關注過一些歐盟與美國簽訂的開放政府採購市場的協議，我們依據各個企業的競爭力進行了嚴格的分類，並邀請他們參加我們通過對外貿易委員會組織的一次公共聽證會。大多數議員確認貿易開放所帶來的利益，批准了該委員會的意見，後來又在全會上通過了這項協議（請參閱馬努埃爾·波爾圖，《新世紀初的歐洲》，歐洲議會發言稿，PPE（PSD）集團，科英布拉，第135-138頁。

<sup>20</sup> 這也符合消費者的利益，但是根據“政策經濟學理論”（或公共選擇理論），消費者很難捍衛自身的利益，引自波爾圖，《一體化理論和歐洲聯盟政策》，第165-173頁。

<sup>21</sup> Vincent Cable，《觀察》，載於 Vincent Cable 和 David Henderson（編著），《貿易集團？未來的區域一體化》，皇家國際關係學院，倫敦，1994年，第13-16頁。

自由貿易的一個途徑。區域經濟一體化可以減少經濟民族主義，提高人們對更大經濟相互依賴的需求及其優勢的認識，或為貿易自由化贏得一些“經驗”<sup>22</sup>。因此，區域貿易集團有助於消除影響貿易自由化的壁壘。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內部擁有良好市場的區域組織，它們的負責人也不會滿足現有規模（不只是前文提到的跨國企業），而總是尋求與其他區域組織和國家發展經貿關係，歐盟就是一個例子。

一些包含主要國家的區域組織，如包括美國在內的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包括巴西在內的南方共同市場，不滿足於區域經濟的範圍，積極地尋找其他市場（如為了出口產品）、其他區域組織或世界範圍內的貿易優惠安排。

“開放的力量”正在成為主流，正如世界貿易組織所稱，“在世貿組織的成員中，不存在阻礙性的區域一體化安排”<sup>23</sup>，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區域集團的成員國推動（艱難）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的結束，從而史無前例地創立、擴大並且／或者加強成員國的市場。

另一方面，還應該考慮到一些國家雖然不是任何一個（或一些）區域集團的成員，但是有很好的國內市場，它們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的能力雖然較小，但同樣是重要的力量。對於這些國家，區域集團的成員應該與它們簽定優惠協定（一方面也給成員國帶來了利益，降低了貿易轉移效應，提供一體化區域的收益）。

認識到國際貿易的優勢之後，區域集團的形成還可以成為談判的便利因素，因為談判者的數目減少了<sup>24</sup>。

我們再以歐盟為例，比如在關稅貿易總協定（現在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中，歐共體作為一個整體參與談判，只有歐委員（通過有權力的委員）根據歐洲理事會授權的談判任期而參加會議。

<sup>22</sup> Cable談到：“區域集團是一個研究可以在多邊進行推廣的、更深入的一體化方法的試驗室（比如產品和技術標準、服務、政府採購、政府補貼、競爭政策和爭端解決）”；Serra等編（著作第17頁）補充道：“區域一體化提供的有益信息可以使多邊協定更令人滿意和經久不衰”。

<sup>23</sup> 世界貿易組織，《區域主義和世界貿易體制》，日內瓦，1995年。

<sup>24</sup> 這一點也被Cable的著作中談到，參閱第12頁；或參閱Christopher M. Dent，《全球化中的歐洲經濟》，Routledge，倫敦和紐約，1997年，第5頁。

## 七

最後，特別應該提到歐盟的例子。在區域集團內成立“單一”市場，雖然首先是為了成員國的利益，但由於單一市場統一和協調的規則也使得第三國的進入更為容易。

例如，隨著歐洲單一市場（根據歐洲單一法令成立）的協調和開放，一個美國、巴西或中國的出口商或投資者可以用相同的形式使自己的產品在歐盟範圍流通，運輸貨品的車輛無需在成員國邊境停下，也無需了解和適應每個成員國不同的要求，只要遵守歐盟相同的規則，滿足產品的科技條件或者遵守公共招標的規則，就可以進入歐盟所有成員國的市場<sup>25</sup>。

歐盟所具有的這種市場准入的巨大優勢，歐洲人在與其他區域集團“單一市場”競爭時也應該享有，因此，同樣深化相關的一體化進程或者開放巨大的國內市場（如中國市場），也符合歐盟的利益。

歐盟與其他重要的區域集團（如北美自由貿易區和南方共同市場）相比，還有獨特的優勢，這就是對於不遵守既定規則的最終審議，歐盟有共同的機構（歐委會和盧森堡法院）。

最後，基本上出於考慮歐洲人利益而創立的單一貨幣，也同樣有利於其他國家：這些國家在歐盟不再有微觀經濟的成本、貨幣的兌換成本、不確定性和計算的成本，並且也可同樣從便於企業活動的貨幣穩定（無通貨膨脹）的環境中受益<sup>26</sup>。

<sup>25</sup> 例如，Anne Murphy，《歐洲共同體和國際貿易體制》，第2卷，《歐洲共同體和烏拉圭回合》，歐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布魯塞爾，1990年，第81頁及續後數頁；以及Stephen Woolcock，《歐洲的實踐和多邊貿易規則：兩者可和諧共存嗎？》，Blackwell，牛津和劍橋（馬塞諸塞），載於Simon Bulmer和Andrew Scott（編著），《歐洲的經濟和政治一體化：在全球化和內部充滿活力的背景下》，1994年，第199-210頁。

為關注促進世界不同地區的競爭問題，經合組織開始於1999年發表一份雜誌，*Revue del' OCDE sur le Droit et Politique de la Concurrence*（也有英文版）。

<sup>26</sup> 還可以補充一點，作為第二大貨幣，歐元為世界貨幣的穩定作出了貢獻（引自馬努埃爾·波爾圖，《“Rapport de Forces”在世界水平的發展》，載於Paulo de Pitta e Cunha（保羅·匹塔·哥納）和馬努埃爾·波爾圖編著的《歐元與世界》（*The Euro and the World*），Almedina，科英布拉，2002年，第281-298頁。

## 几

所有的這一切都指出，自由貿易不僅是我們所嚮往的，事實上，自由貿易的力量也佔據了優勢地位。

高速增長並擁有巨大市場的中國將繼續吸引全世界的投資者和歐洲的企業家，而具有單一市場和單一貨幣的歐洲也將繼續是中國最關切的市場。

對歐盟的關注包括中國所有地區，無疑也包括澳門地區：在不妨礙其他的聯繫下，與吸引二十一世紀目光的重要市場——歐洲——加強聯繫一定會獲益，可以肯定的是，隨著經濟關係的密切，人與人的關係也會更加親密。

科英布拉，2003年10月27日